

生态美学的生发语境及学术困境

黄怀璞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生态美学生发于特定语境, 它以人类生存中遭遇的生态危机为现实基础, 力求在传统哲学中汲取思想资源, 以寻求对以艺术为核心对象的传统美学的完善、丰富和充实, 建立人与自然平等共生的亲和关系。但是, 中国生态美学理论的深化发展目前面临着学科定位不清、缺乏实践操作性、中西理论基点差异导致的思维偏向等学术困境, 这即是理论体系自身的生态“非平衡”问题。

[关键词] 生态美学; 生发语境; 学术困境

[中图分类号] B 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162(2014)01-0088-07

在我国美学研究领域, 有关生态美学的概念称谓除“生态美学”外, 还有“生态型美学”(张法)、“生态环境美学”(岳友熙), 以及运用生态学方法研究文艺问题的“生态文艺学”(余谋昌)、“生态艺术哲学”(袁鼎生)等。名称的差异意味着研究侧重点的不同, 但都基于一个相同而急迫的现实问题: 全球生态危机。从这一点看, 生态美学本身就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生态美学的生发语境

大体看来, 生态美学理论生成、发展的基本语境主要包括: 人类生存的现实语境、传统文化思想语境、美学学科自身的发展语境。

首先, 生态美学生发的人类生存的现实语境。众所周知, 工业社会以后的人类社会发展, 其所依赖的主要工具手段就是日新月异的高科技。现代高科技一方面为人类探索自然使其在最大程度上释放自身能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为人类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 也为人类便捷、优质、高效的生存方式提供了极大便利, 使人们更加坚定了对高新科技的乐观的精神信念——为人类营建更加美满、如意、幸福的未来景象——这也奠定了人类不断寻求科技突破、科学创新的意识基础, 以技术为核心的

工具理性由此成为人类思想的主导观念; 另一方面, 人类在大力运用科技手段带来的丰富多样的工具产品时, 也使人类原本具有的自然天性在逐渐弱化——对科技工具的依赖感益发突出, 人靠自身进行劳作、创造的能力日渐萎缩, 同时, 随着人类掌握自然规律的技术能力日趋成熟, 在掘取更多自然资源、让自然界释放更大能量方面产生了更加贪婪的欲望, 正如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阿诺德·盖伦所言, 在尖端技术使人的劳作趋向于“省力化”(facilitation)的过程中, 那种“朝向世俗的安逸和对世俗物品的热望”心理也达到了顶峰。

阿诺德·盖伦在概括技术世界的特征时打过一个比喻, 认为技术世界“体现出和我们对‘伟人’(great man)的形象相联系着的那些特征。也像伟人一样, 它是创造性的、精力旺盛的, 同时既是培养生命的又是毁灭生命的, 它和原始形态的自然界结合成一种复杂的关系。技术正像人本身一样形成了一种人为的性质(nature artificially)”^[1](P4)。他还指出, 工业时代的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 导致人类“直接经验”、“当代现实感”的丧失: “在各种发展过程——它们靠着自身的办法而逃出了思想或道德的怀抱——的适应方式之中, 最为重要的一种就是当代现实感(feeling of reality)的丧失。欲

[收稿日期] 2013-11-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审美形态研究”(11XZW001)

[作者简介] 黄怀璞(1962—), 男, 甘肃临洮人,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主要从事美学研究

望在遵循着心理学的定律时，也相应地变得放纵不羁——这是既要保持平静又要保持消费的那种流行心情的另一个根源。”^[1]（P50）

丹尼尔·贝尔认为，在工业社会中，“世界变得技术化与合理化了。机器居于支配地位，决定着人们的生活节奏。时间被编排成井井有条、平均分布的年代。大规模生产商品是工业社会的特征，这里，能源代替肌肉提供生产动力，成为提高生产率（即以少获多的艺术）的基础，从而对商品的大规模生产起着决定作用”^[2]（P35）。在世界的“技术化”过程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机器”是关键性工具，但支配机器的又是掌握了操作机器技术的人，因而人是世界“技术化”中的核心。但是，工业时代的工业文明往往表现出难以克服的“技术合理化”与“遏制技术”之间的矛盾。马尔库塞说：“工业社会最发达的地区始终如一地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使技术合理性完善化的趋势，一是在已确立的制度内加紧遏制这一趋势的种种努力。发达工业文明的内在矛盾正在于此：其不合理成分存在于其合理性中。这就是它的各种成就的标志。掌握了科学和技术的工业社会之所以组织起来，是为了更有效地统治人和自然，是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其资源。”^[3]（P17）马尔库塞是在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试图实现对人的思想控制从而导致人的多元多向思维单一化层面上，对工业社会中的意识形态进行反思性批判的，但其对工业社会“技术合理性完善化”特点的归结却切中了工业社会的内在要害。

在世界“技术化”以及技术完善化的时代，在技术“培养生命又毁灭生命”、人的“当代现实感丧失”、人的欲望只“遵循心理学定律”从而促使人变得“放纵不羁”的时代，“工具理性”更为贴切的表述就是“技术热情”，在人对技术的热情过分高涨的情况下，要想阻止人类不断掘取自然能量的欲望膨胀及行为活动，就显得十分艰难，大自然在我们面前呈现出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的惨象就是一种可以想像的结果。

蒙培元说：“现代工业社会使生态问题空前地凸显出来，并且随着全球化的进行，以出乎人类想像的速度和程度继续恶化，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这才引起人类的重视。这是目前人类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重大问题。”^[4]（绪言，P1）基于此，生态美学认为其现实基础是“现代技术对生态肆无忌惮的破坏所引起的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这一现状。它提出的理论前提是传统形而上学对存在的遗忘而导

致的认识论对存在论的褫夺。生态美学的提出就是要反思现代技术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及其根源，扭转认识论框架下美、审美的传统观念，构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审美的生态关系”^[5]（P76）。

其次，生态美学生发的传统文化思想语境。曾繁仁在其著述中曾反复提及这样一种观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有众多关于生态美的论述，同时也影响到近现代西方一些思想家、哲学家生态美学观的形成。他说：“一部中国古代文化史就是探讨天人与古今关系的历史……无论是儒家的‘位育中和’、‘民胞物与’；道家的‘道法自然’、‘万物齐一’；佛家的‘众生平等’、‘无尽缘起’等等都是讲的天人之际的‘生态系统’。而这种东方生态理论在近现代影响了西方众多生态哲学家与美学家，包括梭罗、海德格尔等等。特别是海德格尔的‘生态存在论’哲学与美学观、‘四方游戏说’与‘家园意识’等，成为‘老子道论的异乡解释’。在这样一片如此丰沃的东方生态理论的土壤上，我们相信一定能够生长出既有现代意识与通约性又有丰富的古代文化内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美学。”^[5]（PP. 469—470）在最近的一篇名为《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探索——兼论中国古代“中和论生态—生命”美学》的论文中，他提出当前“紧迫的问题是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探索”，并具体分析了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中“生态话语”的基本构成：生态哲学话语，即“天人之和”的生态—生命论哲学与美学思想，这是以《周易》“生生之为易”为核心的“生生之学”；生态艺术话语，这又体现在绘画艺术、音乐艺术、中国诗学、民间艺术、建筑艺术等五个方面，如“散点透视”、“乐者天地之和”、“诗言志”、“象外之象”、风调雨顺、“法天象地”等艺术方法和观念，包含有重要的生命与生存美学意蕴，因此“中国古代的中和论生态与生命美学是一种具有自己特殊优势的美学形态，在某些方面优于西方古代的静观的形式的美学”^[6]。

受此影响，有学者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寻求理论资源支撑，如：“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它包括宇宙论、价值论和认识论多方面的内涵，构成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色。天人合一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相通、相似，和谐共生。在思维方式上，它表现为一种不同于西方精神与物质分立的认识世界的方法，主张心物合一、体用无间，是一种朴素的系统方法。”^[7]（P18）

生态美学之所以要重新确立自然生态的重要性，除在现实层面上清醒认识到工具理性主义对自然生态的肆意破坏造成的恶果外，其实质就是反思西方自启蒙时期以来日渐突出的“人类中心主义”，实现人与自然的平衡协调、平等共存。自然是一个由诸多要素组成的秩序性整体并以其特有的方式影响人，人是自然这个秩序性整体的一部分并给自然以影响的同时接受自然的影响。汉斯·萨克塞说：“自然以双重方式影响着人，它向观察者展现其面貌，给行动者以探求各种可能性的活动余地。两者都不会不影响人的行为。自然的面貌是一幅动人的、呈现出秩序和关联的景观。……没有什么地方会有毫无关联的事物，自然的面貌也因观察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大小范围的不同而呈现各不相同的样子。这里我们看到什么是秩序：这个统一的整体是以千差万别为特点的，是将许多部分生动地综合为一体的整体。”^[8]（P28）在存在论意义上，人是大自然中的存在者，其他一切也都是大自然中的存在者，存在者的存在既以自身的存在为前提，也以其他存在者的存在为条件，这就是自然存在的相互依存性；大自然中存在者之间的相互依存性构造了整个自然界的生态链条、生态网络，任一链条的损毁都会导致链条整体的断裂和生态系统的失衡，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建基于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哲学认为，人是认知的主体，包括自然在内的大千世界是认知的对象——客体，人认识、探索自然规律的目的就是要改造自然并使自然为人服务，人的意志、追求、目的决定了改造自然的手段、方法，以康德哲学中的“人为自然立法”、黑格尔关于艺术美高于自然美等基本观念为理论典范，并由此确立了“自然的人化”、“人类中心主义”等思想。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则是生态哲学即生态存在论，其实质是“主体间性”，即打破主客二分模式，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视自然与人互为主体，建立人与自然的和合、统一关系：“只有确立主体间性的哲学基础，建立主体间性的生态美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主体间性美学把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看作是主体间性关系，是‘我与你’的关系，是一种有生命的关系，是本真的存在的实现。这样就从根本上消除了人与自然的对立，恢复了人与自然的亲和性、同一性。”^[9]

存在论哲学对“人与自然的亲和性、同一性”的重视，就是强调人的“有生命的个人存在”与自

然界须臾难离的关系，也就是海德格尔的“此在与世界”的在世关系。海德格尔曾指出：“此在是这样一种存在者：它在其存在中有所领会地对这一存在者有所作为。这一点提示出了形式上的生存概念。此在生存着，另外此在又是我自己向来所是的那个存在者。”^[10]（P65）海德格尔还认为，“此在”存在的“实际性这个概念本身就含有这样的意思：某个‘在世界之内的’存在者在世界之中，或说这个存在者在世；就是说：它能够领会到自己在它的‘天命’中已经同那些在它自己的世界之内向它照面的存在者的存在缚在一起了”^[10]（P69）。对海德格尔的这些观点，曾繁仁分析道：“只有这种在世关系才提供了人与自然统一协调的可能与前提，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这种‘主体和客体同此在和世界不是一而二而一的’。这种‘此在与世界’的‘在世’关系之所以能够提供人与自然统一的前提，就是因为‘此在’即人的此时此刻与周围事物构成的关系性的生存状态，此在就在这种关系性的状态中生存与展开。这里只有‘关系’与‘因缘’，而没有‘分裂’与‘对立’。”^[5]（P283）生态存在论追求的就是在打破“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之后走向人类中心与生态中心的统一。

最后，生态美学生发的美学学科发展语境。20世纪后期，传统美学学科力求突破“美的艺术”或“艺术哲学”主要强调审美活动的非功利性（实用性），而以更加宽广的理论胸怀寻求功利与非功利、实用与非实用的结合，寻求与大众现实生活的结合，即在“本质上是非功利的审美活动大规模融入功利性现实生活的潮流”驱动下，寻求审美活动领域的充分拓展：“就是拓展古典时代以纯艺术美为主体的传统审美意识，就是审美观念走出艺术美的局限，打破审美与生活之间的严格疆域，有意识地将新兴的大众审美文化纳入自己的视野，就是走向生活，美化生活，在自觉融入当代社会大众现实生活各领域的过程中焕发自己的新生命。”这种拓展在“装饰审美层”、“娱乐审美层”、“高雅审美层”等方面得到具体体现^[11]（PP. 323—327）。

不止如此，在社会文化由一元走向多元、由高雅走向通俗的转型过程中，审美活动在与现实生活结合时，审美已不再是艺术家、美学家们封闭于艺术、理论之“象牙塔”内的精神独享或自我言说，审美也是科学和科学家的追求，审美还是芸芸众生的心灵期求，审美就是生活，这在学术上内在地赋予美学以更为鲜明的实践色彩，从而也使美学实际

地落脚于实实在在的人类生活,“人诗意地栖居”不再是海德格尔式的理论幻想,而就是我们生活的现实。1990年代以后,我国文学、影视等艺术创作中的“平民化”、“大众化”倾向即是对此理论观念的响应。其实,我国美学界1980年代的“科学美学”(如物理美学、数学美学等),1990年代以来的“实用美学”(或“应用美学”亦即“审美应用学”,包括环境美学、工业美学、饮食美学、服饰美学、技术美学等)、后现代美学,以及对自然审美现象的充分重视等等,无不成为对以艺术为核心对象的美学学科的反思性研究。

美学在走向生活,美学学科内各分支学科的实际衍生、发展在充实、完善美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同时,不但显示了美学在适应社会时代巨变时的学术敏锐性,而且表明美学只有在不断突破原有学科体系的桎梏时,才会生机勃勃。

二、生态美学的学术困境

也正是有了极其紧迫的生存危机感和必需的思想理论基础,以及学科自身变革、转换的内在要求,以高度关注人类生存现实为目的的生态美学的登场就显得必要且适逢其时。生态美学在未来生存(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上关注人类生存现实,因此需要在更高层次的哲学层面上确立其学术研究的逻辑路径——哲学基础。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是生态哲学或生态学世界观:“是运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观察现实事物和理解现实世界的理论。……运用生态系统整体性观点观察和理解现实世界,是把生态学作为一种方法,即生态学方法。这是科学认识的生态学途径,或科学的生态学思维,即运用生态系统整体性观点认识现实事物,揭示各种事物和现象相互联系和发展变化的规律性,从而认识和解决现实世界的种种问题。”^[12](PP. 33—34)此即曾繁仁所说的“生态存在论哲学”:“是一种‘此在与世界’的在世模式,力主人与万物共生,共同构成世界,但作为‘此在’的人具有领会与阐释万物之意义与价值的功能。”^[5](P461)“运用生态系统整体性观点认识现实事物,揭示各种事物和现象相互联系和发展变化的规律性”无论表述为“生态哲学”还是“生态存在论哲学”,主张“人与万物共生,共同构成世界”的基本旨归是一致的。

我们并不赞同“生态美学是一个时髦的伪命题”的偏颇观点^[13],但事实上,生态美学的中国式话语表达确实面临一些亟需破解的学术难题,也

使生态美学在学术上遭遇两种困境,一是理论自身的,二是时代现实的。从时代现实看,人类已具备良好的生态平衡意识,如保护环境、珍爱自然,与自然平等共生、和谐共存等观念,但在商业大潮、经济利益驱动下,很难将这些意识、观念落实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过度开采地球资源、污染自然环境、滥伐乱砍原始森林、盗杀偷猎各类动物、滥用剧毒化学品等行为比比皆是,对自然的伤害、损毁可谓触目惊心。要解决这些问题,则是一个十分复杂、艰巨、长期的社会工程,因此本文只就生态美学理论自身的学术困境做些必要的分析说明。

首先,生态美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在我们看来,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一样,其成长、发展、成熟的过程,一方面需要汲取其他学科有机理论营养以不断丰富、充实、完善自身,以保证它始终有一种新鲜的理论血液、宽广的学术视野;一方面是在汲取其他学科理论营养的基础上,其自身内部也存在学科分支的不断生成与发展问题。譬如,我国美学界1980年代的“科学美学”研究中,一般将其视作为美学与科学(艺术与科学)结合的产物,是对美学学科的重要补充和完善,它要探讨的是科学家在揭示自然界客观规律的过程中形成的科学理论是如何体现自然之美的,它既寻求自然美与研究自然的科学理论在审美感知中的统一,还寻求科学理论与对科学理论的欣赏在审美感知中的统一;再如,1990年代的“实用美学”研究,它强化了美学走向现实生活的实用性,被认为是美学学科的衍生性分支。以此观之,生态美学作为生态学与美学结合的产物,是美学学科在当代社会新的发展,是美学借鉴生态学研究方法、理论成果对自身的补充与完善,在方法论上具有拓展美学学术研究视野的重要意义。这就是说,就目前对生态美学的研究而言,它还是在一定阶段对美学领域的强调,或是对某一独特研究视角的重视,是对传统美学基本内涵的丰富、充实,但如果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看待,并试图在建立其新学科体系的过程中寻求“它对传统学科的质的飞跃,则为时太早”^[14]。

有学者说:“从字面看,它是生态学与美学交叉而成的科学,是美学的分支,或者说是生态学的分支。……生态美学的生成,具有美学转型的意义,是美学形成新范式的标志,是美学进入新时代的表征。”^[15](P115)将生态美学看作“美学的分支”,在美学转型的意义上视为“美学形成新范式

的标志，是美学进入新时代的表征”，这些无疑是正确的。但我们以为，从语用学角度看，“生态美学”作为一个偏正型词组，其中的“生态”是对“美学”的限定（“偏”），“美学”是核心（“正”），因而“生态美学”的逻辑出发点是生态学观念在美学中的运用，其逻辑内涵是以生态学方法、生态哲学观进行的美学研究，是美学学术视角的转换和领域的拓展，因此它只能是美学的学科分支即“美学分支”，而不是“生态学的分支”。更需注意的是，将生态美学看作“生态学的分支”的理论危险性在于，会使美学的学科性质发生我们不愿看到的变化。学术界公认，美学的学科性质是人文科学；而生态学属于自然科学，尽管当代生态学已经综合运用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中某些学科如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理论成果，但其自然科学的这一基质并未发生变化；我们不可否认生态美学研究中以生态学为核心的自然科学知识的重要性，甚至具有相当重要的基础性意义，但生态美学却不能是“生态学的分支”，否则会使生态美学成为自然科学。

其次，生态美学的实践性或具体操作性。曾繁仁认为，生态美学观从四个方面体现出对实践美学的超越：“其一，是由美的实体性到关系性的超越。其二，是由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超越。其三，在自然美的理解上由‘人化的自然’到人与自然平等共生亲和关系的超越，也是由‘自然的祛魅’到部分的‘自然的复魅’的过渡。其四，是由美的单纯认识论考察到存在论考察的超越。”^[16]人对自然的影响既表现在过程上，也表现在结果上，前者是“自然的人化”，后者是“人化的自然”，但都体现的是哲学认识论主客二分思维方式影响下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生态美学力求突破“人类中心主义”，在追求建立人与自然平等共生的亲和关系时，要实现由“自然的祛魅”到部分的“自然的复魅”，即还原由人所改变了的自然本真的某种神秘、混沌之原始面貌，但其“复魅”过程中的愿景实质仍无法完全摆脱生态美学理论内在隐含的“必然要保护人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的内在思维的束缚；而且，人类与自然的平等共生的亲和关系的形成，还意味着“牺牲、放弃人类的局部利益、暂时利益”，因而生态美学“说到底仍然是以人类为中心的理论构想”^[14]。这并不会让人乐观，但却是一个不能不深入反思的问题。因为，就目前生态美学的研究现状而言，有关实现人与自然的平等共生，达到既非“人类中心”亦非“生态中心”的整合统一，至多

还是一种理论上的逻辑假设，还不具备介入现实的、可操作性的实践品格。

曾繁仁在《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生态美学导论》等著作中对环境美学、生态美学作比较研究并进行二者的关系讨论时曾说：“‘环境美学’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它以‘景观美学’与‘宜居环境’为其核心内涵，涉及到城乡人居与工作环境建设的大量问题，带有专业性、可操作性与现实的指导性。这一点是当前的生态美学研究所难以做到的，而且也是需要向其学习的，因为生态理论的根本特性就是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当然生态美学在城乡环境建设中的指导作用到底如何发挥，还是可以讨论的问题。”^[5]（P470）关于这一点，刘成纪先生敏锐地指出，生态美学介入现实实践的困难“根本的问题就是它在本质上是反实践的”，“它无限肯定事物的自然生成，将非人工的原生态自然视为美的典范，这必将使任何对自然进行加工的企图都缺乏理论的正当性。但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生态美学的目的并不是让人重新回到原始的荒蛮状态，而是要以生态观念缓解人给予自然的强大压力。从这个角度讲，生态美学之于当代社会的意义，并不在于生态理想的最终实现，而在于如何将生态的观念融入对现实生活的调整中。”^[17]将生态美学的生态观念“融入对现实生活的调整中”，就是启发人们追问、反思人类恣意利用各种技术手段给予自然的、超过自然限度的巨大压力，从而调整、转换人们的观念意识；而如何认识、克服、解决人类“对自然进行加工”与“非人工的原生态自然”之间的矛盾，生态美学尚未提供理论上的正解。

加拿大环境美学家卡尔松说：“既然在艺术欣赏的新模式前提下，艺术中严肃的、适当的审美欣赏是通过艺术史传统和艺术批评实践这些知识在认知层面上加以塑造的；那么与之相类似，在自然中为了实现严肃的、适当的审美欣赏，它也必须通过自然史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在认知层面上加以塑造。因此，我认为在自然审美欣赏中占据中心位置的知识应是如地理学、生物学还有生态学所提供的知识。”卡尔松在谈到环境美学对传统的拘泥于“感官与形式属性”认知途径扩展问题时进一步指出，“自然的美学欣赏除了在纯粹形式层面之外必须加以概念化，在某种程度上还应包括自然环境的表现属性”，因此，“认知途径将自然环境的欣赏与科学知识相联系，从而在环境美学中占有中心地位。进而，从以下两个相关方式上塑造着环境美

学：第一，其应用从自然扩展到整个世界范围；第二，它所考虑的知识不仅仅包括科学所提供的知识。这种塑造方式被科学知识对自然欣赏的解释中所暗示出来——事实上就自然而言，主要是这样一些相关知识：它为何如此，它为何物，以及它像何物这些知识。……同样地，在自然世界层面上欣赏世界，在美学意义上与之相关的知识便是，它为何如此，它为何物，它像何物，更严格地说，这些知识与科学知识是否有关。”^[18]（PP. 9—10）卡尔松还认为，就环境而言，在对农业景观、田园乡村、城市景观及其他景观进行审美欣赏时的一系列知识，便是“它们像什么和它们为何成为现在这样——的集合”，从而使环境美学与美学中不同艺术形式间的边界相互碰撞（如园林与建筑），同时涉及其他相关领域的理论基础（如景观生态学与人文学地理学），还与景观批评相联系。可以想见，一种与农业、城市、园林、建筑等景观及田园乡村、其他艺术相关联的环境美学，既体现出自身巨大的理论包容性，还涉及到多样的有关环境的科学知识，同时又有明显而突出的实践操作的可能性。

无疑，在我们积极倡导生态平衡、生态文明建设的当下，生态美学的理论主张确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作为一种在中国语境下“首创”或“原创”的生态美学理论，还只囿于“理论到理论”的框架之中，同时，在极力从传统哲学文化思想中寻求观念支撑的情况下，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其自然科学的知识基础，就难以真正发挥对现实生活的实践作用。

最后，中西理论基点差异导致的学术偏向。曾繁仁反复强调，生态美学是在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思想影响下的当代中国语境中的产物，它强调人在品鉴原生自然时的各种感知器官的共同参与（一如伯林特的“参与美学”），优于传统美学只重视看听感知的审美方式；由于重视各种感官的共同参与，充分调动全部感官的动态投入，因而生态美学优于西方美学特别是康德美学以来的“静观”方式。但应该看到，生态美学赖以建立的中国传统哲学的观念基础，其价值主要是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思想资源，这种哲学分析的方法在实践层面上并未提供具体实用的操作原则。西方生态美学的学科基础是自西方 19 世纪中期以来以海克尔等为代表的生态学，以自然科学为背景的西方美学关于自然生态的审美考察，其基本研究路径是具体描述、客观实证，然

后诉诸定量分析，这就形成了理论基点的差异：我国生态美学采用哲学分析方法，西方生态美学多用科学实证方法。西方生态美学研究建基于生态学观念：“西方生态美学首先建基于近代生物学，进而引申为生态学，然后发展为生态美学。这种以自然科学为背景的学术进路，意味着生态美学家首先应是一个博物学家，然后才是自然生态的审美品鉴者和理论建构者。……所谓生态美学，虽然在美学层面离不开作为审美体验者的人，在价值层面更是以人的生存幸福为最终目的，但对自然对象的科学认识却是它成立的前提。”^[17]“对自然对象的科学认识却是它成立的前提”意味着“生态美学”在研究视角上的切入点必须是自然科学的生态学，正如本文前面所说，其逻辑出发点是生态学观念在美学中的运用，其逻辑内涵是生态哲学观影响下，以生态学方法进行的美学研究。故此，没有对以自然为对象的实证性科学研究、科学认识及在自然认知基础上的丰厚的科学知识累积，生态美学研究中必需的“生态学”方法即是一种纯理论的逻辑推演。

总体看，以哲学分析为方法的中国生态美学，其基本学术路向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坐而论道”观在当下生态美学研究中的体现，走的是一条“形上”思维之路，其学术理念的生成、学术思想的表达表现为“由理论到理论”，因而在发挥其实践功能时即显出无能为力之势；以科学实证为方法的西方生态美学，其基本学术路向是 19 世纪以来的科学实证传统中的“事实量化”观对生态美学的启示，走的是一条“形下”思维之路，亦即以自然科学的生态学方法反思人文科学的生态美学，其学术理念的生成、学术思想的表达体现为“由事实到理论”，以对自然生态的科学研究、科学认知为事实基础的对自然生态的审美探索，在与环境美学、景观学科以及生态文艺批评等相结合时，就不仅扩展了生态美学的学术视野，也大大强化了其实践功能。

看来，以生态化生存为目的的中国生态美学面临的上述困境，就是其理论体系自身的生态“非平衡”问题。但是，生态美学是否已陷入其间不能自拔？回答是否定的。中国生态美学的学术研究思路若能进一步强化与其他相关实践性学科之间的联系，从纯理论的逻辑演绎中走出来，解决好理论体系自身的“非平衡”问题，更好融入到时代生活的各实践领域中，它就会有巨大的学术提升空间。

[参考文献]

- [1] [德] 阿诺德·盖伦. 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 工业社会的社会心理问题 [M].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3.
- [2] [美] 丹尼尔·贝尔. 后工业社会 (简明本) [M]. 北京: 科学普及出版社, 1985.
- [3]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 [4] 蒙培元. 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5] 曾繁仁. 生态美学导论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 [6] 曾繁仁. 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探索——兼论中国古代“中和论生态—生命”美学 [J]. 中国文化研究, 2013, (1).
- [7] 赵载光. 天人合一的文化智慧——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与哲学 [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 [8] [德] 汉斯·萨克塞. 生态哲学 [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1.
- [9] 杨春时. 论生态美学的主体间性 [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 (1).
- [10] [德]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
- [11] 薛富兴. 文化转型与当代审美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 [12] 余谋昌. 生态哲学 [M].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 [13] 王梦湖. 生态美学——一个时髦的伪命题 [J]. 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 (2).
- [14] 吴家荣. 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的学理性质疑 [J]. 学术界, 2006, (3).
- [15] 袁鼎生. 生态艺术哲学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 [16] 曾繁仁. 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生态美学观 [J]. 文学评论, 2005, (4).
- [17] 刘成纪. 生态美学的理论危机与再造路径 [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2).
- [18] [加] 艾伦·卡尔松. 自然与景观 [M].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Geminal Context and Academic Difficulties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HUANG Huai-pu

(College of Literatur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PRC)

[Abstract] Ecological aesthetics is generated in the particular context, based on the ecological crisis human beings encountered, strives for digging in traditional philosophy and learning resources of thoughts, so as to search for the improvement and richness of traditional aesthetics with art as its core objective, and establishes equal symbiotic affin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Howeve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logical aesthetics theory is facing academic difficulties, such as no clear subject orientation, lack of operational practic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theories leading to thinking bias, which is the ecological “unbalanced” problem in theoretical system.

[Key words] ecological aesthetics; geminal context; academic difficulties

(责任编辑 王明丽/校对 维佳)